

目 錄

序言	1
第一章 引論	1
一 爲什麼選擇閻若璩	1
二 閻毛之爭	2
三 《疏證》枝蔓考	4
四 鍛鍊成獄和多聞闕疑	7
第二章 文獻流傳篇(上)	11
一 黽錯傳本與承詔作傳	11
二 孔安國蚤卒、家獻	15
三 東漢杜林本古文《尚書》	20
四 誰是作僞者	27
五 唐人義疏文獻條件和學術能力	35
第三章 文獻流傳篇(中)	41
一 十六篇與二十四五篇	41
二 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44
三 閻氏《疏證》根柢所在	50
四 虞夏書之分	55
五 《尚書》載歲祀年	59

六	《堯典》帝曰、兪曰	61
七	二典分合	63
八	古帝名號	70
第四章	文獻流傳篇(下)	74
一	《史記》多古文說	74
二	《說文》引《尚書》異字	86
三	《說文》引《尚書》此有彼無者	95
四	《書序》益稷、棄稷	102
五	孔注《論語》《尚書》比較	104
六	孔《傳》舍《魯》用《毛》	114
第五章	史地篇	117
一	金城問題	117
二	瀘水、孟津、駒驢問題	124
三	濟瀆改道	128
四	孔《傳》注《禹貢》三江	135
第六章	史實篇	137
一	《大禹謨》不讓稷、契	137
二	太康失國其母存否	140
三	《太甲》三年、六年	144
四	《泰誓》聲紂之罪	147
五	血流漂杵與孟子不信《書》	150
六	孔《疏》注《武成》式商容閭	153
七	六師、太保是否追書	158

八	《書序》西旅獻斿	160
第七章	曆法篇	162
一	《武成》篇日月書法	162
二	《胤征》日食、曆法(上)	166
三	《胤征》日食、曆法(下)	171
第八章	制度篇	179
一	太甲稽首,伊尹稱字	179
二	古未有夷族之刑	184
三	誥誓不及五帝	186
四	《武成》商郊牧野	193
五	孔《傳》解官制大馭、太僕	195
第九章	引文篇	202
一	九夷八蠻與引文問題	202
二	虞廷十六字	204
三	《左傳》德乃降	209
四	《史記·河渠書》引《夏書》	214
五	《尚書》爲山九仞四語	218
六	《泰誓》于湯有光語出何人	228
七	《孟子》引《書》天降下民二語	232
八	《論語》孝乎惟孝	238
第十章	結語	242
一	紀昀與古文《尚書》定案	242

二	錢大昕《疏證》最精者	246
三	《疏證》方法辨析(上)	251
四	《疏證》方法辨析(下)	262
五	學問貴誠,真在誠中	274
六	辨僞學的合法性	275
七	無罪推定與大膽假設	279
八	辨僞學證據審查	283
九	我的自向證明	292
十	評張蔭麟再鞠古文《尚書》案	294
十一	胡適:用證據法審核考據學	305
附錄一	:《大禹謨》引文、用文示例	307
附錄二	:《尚書》字頻特徵分析	315
附錄三	評戴震考據“光被四表”	335
附錄四	:本書主要徵引文獻	364
後記	371

序 言

—

《尚書》在中國文化史和學術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我從事先秦歷史文化研究多年，隨著對三代史認識的深入，逐漸認定所謂“偽古文《尚書》”的“定案”無法成立。本書是對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一次全面甄別，涉及歷代古文《尚書》研究中全部主要問題。本書結論：閻若璩的研究遠遠不足以支撐其結論。不僅如此，閻氏書中還包含許多刻意捏造的偽證。如果中國學術史中這一絕大問題的“定案”實際上是一個錯誤結論，那麼能否以及何時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對當代中國歷史學界學術水平的一次檢驗。

閻若璩是清代學術主要奠基者。梁啟超說：“閻若璩之所以偉大，在其《尚書古文疏證》也。”孔傳古文《尚書》是歷來“證偽”對象中最重要儒家經典，經閻氏《尚書古文疏證》“定案”為“偽書”，即所謂“偽古文《尚書》”。時至今日，如果有誰在文章中引證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內容，在大部分專家看來，這樣的引證已經違背最起碼的“學術常識”——所謂“鐵案如山”。

汪中將閻氏列為“國朝六儒”（顧炎武、胡渭、梅文鼎、閻若璩、惠棟、戴震）之一，認為閻氏《疏證》是“千餘年不傳之絕學”。梁啟超一方面贊同汪中見解：“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另一方面

將其約減為四：“然語於思想界影響之巨，則吾於顧、戴之外，獨推閻、胡。”清代和民初重要學者對閻若璩及其《疏證》多給予非常高的評價（詳見本書開篇《為什麼選擇閻若璩》）。

閻氏《疏證》對清代學術走向具有極大影響。

第一，直接推動清代“漢學”的形成。下面是梁啟超對這一過程的描述：“自閻若璩攻偽古文《尚書》，後證明作偽者出王肅，學者乃重提南北朝鄭、王公案，繼王申鄭，則復於東漢。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矣。懸崖轉石，非達於地不止。則西漢今古文舊案，終必須翻騰一度，勢則然矣。”由於這個原因，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將閻氏列為清代漢學家第一人。《大禹謨》“十六字心傳”是宋明理學的核心命題，閻若璩對“偽古文《尚書》”的“定案”使之失去依據。這也是清儒背離宋學的重要契機之一。

第二，開“為考據而考據”的學風。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胡渭《禹貢錐指》等著述樹立了考據學旨趣和方法的範例，背離清初諸老通經致用的為學宗旨，形成為考據而考據的學風。此風大盛於乾嘉漢學。

第三，開三百年來疑古之風，由疑諸子傳注進而疑經。梁啟超指出：“自閻若璩攻偽古文《尚書》得勝，漸開學者疑經之風。於是劉逢祿大疑《春秋左氏傳》，魏源大疑《詩毛氏傳》。若《周官》，則宋以來固多疑之矣。康有為乃綜集諸家說，嚴畫今古文分野，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皆劉歆所偽造。”

按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劉歆偽造古文經傳”之說實為謬說，參閱錢穆先生《劉向歆父子年譜》。

二

梁啟超概括中國學術(秦以後)時代思潮“四者而已”: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或謂漢學、樸學、實學)。宋明理學援佛入儒,非甲非乙,注釋經典常“恃胸臆爲斷”,其學屬哲學範疇,處理形而上問題,“遊談無根”,“虛”多“實”少。由於理學旨趣不在史實,故對當代史學研究影響甚微。

清代學術“由虛轉實”,“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研究具體問題,“實”多“虛”少。再向後,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整理國故”。這是中國現代史學的形成過程,其主流是以顧頡剛先生爲代表的“古史辨運動”。清代學術是民初學人的知識基礎。祇要身處這個時代,誰也無法擺脫其影響。

由於梁啟超、胡適等重要學者對清代學術“科學方法”的充分肯定(包括他們對閻若璩的備加推崇),導致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和一些重要學術結論直接進入現代史學。比如,從閻若璩、崔述到康有爲的“辨僞學”,爲“古史辨運動”興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疑古成果”基礎;又比如,“古史辨派”學者的治學方法大多直接來自清代學術。

清代考據學主治經學,旁及史、子,其主要內容包括:訓詁(詮釋字、詞音義)、考據(探究經典中的疑難內容,如史事、名物、山川、地理、天文、曆算、術數、典章制度等)、校勘(比對不同版本,推斷經典中的正確字詞)、辨僞(研究文獻真僞)、版本(鑒定古籍年代)、輯佚(從文獻引文中輯錄佚書內容)、目錄(文獻分類)等等。

中國現代史學由兩個主要部分構成:清代傳統學術和西學

東漸成分。考據學解決形而下問題，研究方向是查明事實真相，研究結果是確定古史和古文獻的有無和真偽，故其方法和結論仍在直接影響當代史學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宋明理學屬於“古代學術”，則清代學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當代學術”。

三

清代考據學（漢學）形成的外在原因，是滿清征服者的文化高壓政策，及其對文人士子的利誘籠絡。其結果是“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再有，就是康雍乾對經學的提倡，及其組織對經典的注疏和大規模編書。弘曆編修《四庫全書》“寓禁於徵”，其禁毀典籍的數量相當於《四庫全書》收書總量。康雍乾三世大興文字獄，大規模禁毀“違礙”書籍，清代考據學的興起與中國歷史上這一場空前的文化浩劫相同步。

後人或謂清代學術始於“寧人（顧炎武）百詩（閻若璩）之風”，實則二人學問人品已大不相同。錢穆先生說：“此種變遷，洵可歎也！”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明末遺老多為剛正不阿之士，閻若璩、胡渭則是柔媚名利之徒（二人都曾主動向玄燁獻頌詩以邀寵）。近讀錢大昕《皇太后七十萬壽頌》，頗有感觸。一篇序文加十四首頌詩，約一千字，二百三十八句，每句都有出處，且全都出自神聖經典《十三經》。雖是殘言斷語雜湊而成，妙在文意貫通，詩有韻腳。如此才華文章，阿諛重禮，百世罕有。

誠如梁啟超所說，清代學術走向是“節節復古”，由宋明復於六朝、唐，再復於東漢（古文經學），又復於西漢（今文經學）。至於是否如梁氏所說“節節復古”可以實現“以復古為（思想）解放”，則須另當別論。在滿清征服者文化高壓政策之下，中國知

識分子避禍於故紙堆中。所謂“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粱謀”。殘暴嚴密的思想言論鉗制，導致乾嘉時代考據學獨盛，其學風就事論事，支離破碎，門戶壁壘，思想貧乏。這是病態扭曲的“學術狀態”，是剛正人格和創造能力被“剃髮”的結果。這個過程十分鬱悶可悲，與“思想解放”背道而馳。

在清代學術演化脈絡中，黃宗羲、顧炎武開其先河，閻若璩和胡渭是漢學（古文經學）的“直接奠基者”。乾嘉時期的漢學主要有：以惠士奇、惠棟父子爲首的“吳派”（其代表人物如惠氏弟子王鳴盛、錢大昕、江藩等）和以戴震爲中心的“皖派”（其代表人物如戴氏後學段玉裁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二者都屬於梁啓超所謂清學“全盛”期的“正統派”。此外，尚有以焦循、汪中爲代表的揚州學派，以全祖望、章學誠爲代表的浙江學派等等。

乾嘉漢學乃至整個清代學術的主要工作，是對古代典籍的注釋、整理，以及史實考核、史料補訂。這是清代學術的“樸學”部分，其建樹多繫於此。名家輩出，著述宏富，成就斐然。有必要指出，樸學成就中較少創造性成分，煩瑣細碎有餘，缺乏宏觀視野中的分析綜合。故今人於清學須作兩面觀。

四

考察清代學術得失的角度，在門戶，在方法。乾嘉漢學（古文經學）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搜羅東漢經說幾無遺漏，此其得。由於偏重東漢，兩晉六朝唐宋以來千餘年經學成就多被忽略，此其失。晚清今文經學捨棄賈馬許鄭而復古於西漢，且專主《公羊》學，以微言大義援經議政，其旨趣不在史而在用，其失在附會經說。門戶局限，各有所失。

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胡適以較大篇幅分析戴震關於《堯典》“光被四表”當作“橫被四表”的考據，將其作為清代學者以“科學精神”進行“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的重要範例。此一字訓詁雖無關要旨，由於有錢大昕、姚鼐和戴氏弟子洪榜、段玉裁等著名學者參與尋找證據，因此成為清代文字考據中的經典例證。我對此專門下過一番工夫（參閱本書附錄三《評戴震考據“光被四表”》），結果發現戴震的結論不能成立，他的“大膽假設”已經超越文字訓注方法合理使用限度，實為清代考據學不夠嚴謹的“經典例證”。

考據學方法有其合理使用限度，過猶不及。當認識對象比較複雜，認識素材極不充分，此時提出“大膽假設”難免主觀武斷。如果在“小心求證”時祇收集有利證據，見到相反證據卻隻字不提，這樣的考據已經背離“科學精神”。嚴格說，“通假”等因聲求義（包括引用字書音義標注）的訓詁學方法是或然性的解釋依據，祇提供可能，不提供確證。戴震“光”字考據就是對此類方法的過度使用。清代考據學中這種現象比較多見。這是朴學之內華而不實的成分，最終成為六經注疏的重要工具。民初學人大多使用過這種方法，且十有八九是過度使用（相關例證見本書附錄三《評戴震考據“光被四表”》第十部分“考據學方法的使用限度”）。

清代學術的樸學部分，薪火相傳，不分今古，始於顧炎武，終於孫詒讓。樸學大部分基礎性工作比較嚴謹求實，但由於其中存在方法缺陷，故有必要作一番得失考察。在問題比較複雜的場合，對“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尤須細加核實。樸學中問題最複雜，採用“大膽假設”方法最集中的場合は“辨偽學”。這項研究的結果，直接決定古史和古文獻的有無和真偽。

史料是史學認知的素材。史料之於史學，如同走路要有路徑。如果發生將重要且珍貴的真文獻“誤判”為“偽書”，是對史學研究條件的惡性破壞。換言之，“辨僞學”一旦出錯，其後果十分嚴重，是歷史學家作繭自縛，是“沒過河，先拆橋”，比酷吏枉罰無辜更加愚蠢荒唐。因此，有必要將其從樸學之中區分出來，對其理論、方法、證據、證明步驟和主要結論進行一次全面徹底的嚴格甄別。

五

當代學人的古文獻研究條件已經發生質的改變，這裏主要指借助電腦軟件的文獻檢索條件。在古史和古文獻研究中，任何一個具體研究結論是否成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證據（書證）的質量。古代文獻學大家無不記憶超群，即使如此，由於典籍浩如煙海，其全部工作量一半以上要用於翻閱文獻、查尋書證。

毫不誇張地說，僅本書所舉書證，若以傳統方法翻檢文獻，且以一人之力專行此事，至少要用數十年查找工夫。借助電腦軟件的文獻檢索條件，可以迅速準確地處理海量信息，可以在數年內完成傳統方法數十年才能完成的檢索。極大工作量的文獻查尋困難由此迎刃而解。

對於古代文獻學家來說，這種效率本身就是一個奇迹。如果鄭康成再世，這樣的技術手段會令其欣喜若狂；如果顧炎武復生，他一定會對《日知錄》做出許多修訂（顧氏所謂“昔日之所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從“大海撈針”到“一網打盡”，古史和古文獻研究領域這場“操作技術”的革命悄然發生於最近十餘年間。

我國的古籍數字化建設速度很快，目前已經有了幾個大型古籍全文數據庫（比如《國學寶典》、《四庫全書》和《四部叢刊》等）。這是當代學人一大幸事，也是“國故學”基礎研究發展健全的重要轉機。當代學人擁有檢索效率的巨大優勢，同時擁有相對成熟的證據學作為參照，還有嚴格的邏輯學甄別標準。“汽車”已經取代“牛車”。我們駕駛“汽車”超越“牛車”上的清代學術以及近代疑古學派，實乃以逸待勞，以強凌弱，多少有些勝之不武。但是，如果我們駕駛“汽車”尾隨於“牛車”之後，惟其牛首是瞻，則十分不可取。

六

在清代考據學中，“辨僞學”對中國現代史學知識結構的影響最大。三百年來疑古之風一脈相承，閻若璩是其第一人。在孔傳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被“證僞”之後，更多的古文獻（包括《堯典》、《禹貢》等今古文《尚書》共有篇章）被判定為“僞書”，乃至整個中國歷史被“縮短”。

所有這些“疑古”研究及其結論，均以閻氏《疏證》為其釜底之薪。因此，本書對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甄別，不在學術史範疇，而是當代史學批評的起點。

第一章 引 論

一 爲什麼選擇閻若璩

閻若璩(1636—1704)在疑古學派學術傳統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孔傳古文《尚書》是歷來“證僞”對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經典，經閻氏《尚書古文疏證》(以下簡稱《疏證》)“定案”爲“僞書”。這是疑古學派傳統中頭等大事，是最成功的“證僞案例”。他被公認爲清代考據學主要奠基人之一。

黃宗羲評價《疏證》：“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①紀昀說他“博極群書，又精於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②，“反復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③。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將其列爲清代漢學家第一。梁啓超說《疏證》“委實是不朽之作”^④，說他對古文《尚書》的“證僞”是“毅然悍然辭而辟之，非天下之大

① 黃宗羲：《尚書古文疏證·序》。

② 《四庫提要·四書釋地》。按據《清史稿》本傳，《四庫提要》爲紀昀所撰。具體是在“分纂稿”基礎上考核刪定而成。

③ 《四庫提要·尚書古文疏證》。

④ 梁啓超：《古書真僞及其年代》，陳引馳編校《梁啓超國學講錄二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210頁。

勇，固不能矣”^①，“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②。胡適說《疏證》“遂定了偽古文《尚書》的鐵案”，並將閻若璩的方法與伽利略、牛頓的方法等量齊觀^③。顧頡剛認為閻氏的辨偽精神“注定了我畢生的治學的命運”^④。

如果讓內行人舉出新舊疑古學派兩個最具代表性人物，十有八九會說：閻若璩、顧頡剛。《疏證》在“疑古成果”中打下半壁江山。故“走出疑古”繞不開他，繞開了走不出去。《疏證》將此前（從朱熹到梅鷟）與之相關的主要論述囊括其中，被認為是“《尚書》學史上集辨偽之大成的著作”。此後（從惠棟到崔述）的相關著述，至少十有七八是對該書論證的變相重復。所以對《疏證》的分析實際上就是對宋元明清四代學人古文《尚書》“定案”依據和方法的正面考察，同時也是對清代考據學是否存在問題以及存在多大問題的一次檢驗。

二 閻毛之爭

閻氏撰《疏證》“證偽”古文《尚書》，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力辨其真。此事轟動一時。二人才氣絕高，同是“漢學開山者”^⑤。歷來評論大多褒貶分明：是閻非毛——前者人品好、學問好，後者反之。錢穆先生則認為，二者至少在人品上“兩無足取”：“西河（毛奇齡）潛邱（閻若璩），其博辨縱橫傲睨自喜之概，

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4頁。

②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86頁。

③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4），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05頁。

④ 顧頡剛：《古今偽書考·序》，見《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中華書局，1955，253頁。

⑤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278頁。

讀其書者，固見其呵斥先儒，譏彈前賢，上下千古，若無足置胸懷間，意氣甚盛。而其晚節之希寵戀獎，俯首下心於朝廷聖天子之前，亦復何其衰颯可憫憐之相似耶！”^①

據疑古學派研究，古文獻“作偽”主要動機之一是“炫名”（這是一個悖論）。閻、毛不是作偽者，而是文獻真偽的辯駁者，但均有“炫名”之嫌。閻氏生平是場多少有些荒誕的悲喜劇。他自負極高，屢試不中，於是以撰《疏證》而成名。晚年則“希寵戀獎”，康熙南巡江浙，他進獻頌詩渴望召見，卻未能如願。於是命其子北上，獻所著書及《萬壽詩》多首，希望求到康熙御書一幅字（褒獎其學問）。胤禛手書請他進京設法相助，他臥病在牀，得書不勝惶恐榮幸，霍然而起，不顧年老病衰，千里奔波，日夜兼程，趕赴京師。被胤禛請進府邸，不日病情加重，故紙堆中一世雄才因此送命。病重時友人探視，語以老當自重，不知他彌留之際作何感想。享年六十有九。毛奇齡早年抗清，後應試博學鴻儒科，得翰林院檢討，也曾向清帝獻書獻頌以邀寵，章太炎說他“晚節不終，媚於旃裘”。

閻氏“負氣求勝，與人辯論，往往雜以毒詬惡謔”，毛氏著文亦多“狂號怒罵”。錢穆先生“陋儒（按此評價始出全祖望）”和“才奇行卑”的評語對二人都適用。據錢穆先生考據，毛氏《冤詞》凡引《疏證》內容加以駁難者，都隱去姓名而冠以“或曰”^②。《疏證》八卷，128條，刊行本闕29條。錢穆先生認為闕文原因有二：一是見《冤詞》駁難有據者，自行刪去^③；二是內容調整，移入他卷^④。

①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257頁。

② 同上書，272頁。

③ 同上書，273頁。

④ 同上書，268頁。

閻氏見《冤詞》後對《疏證》作大幅度刪改調整，甚至“本爲《冤詞》難《疏證》，今轉成《疏證》難《冤詞》”^①。閻氏刪改調整“全不肯認是見西河《冤詞》後所追改”^②。錢穆先生所謂“考據家之不德”^③。杭世駿謂閻氏書多刺譏時賢，“惟固陵毛氏爲古文《尚書》著《冤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於其鋒焰，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④。

前面提到，大多數學人對閻毛之爭的評論是一邊倒。這裏不妨作一“換位思維”：既然西河《冤詞》可以迫使閻氏對《疏證》四分之一內容作大幅度刪改調整，任何人沒有任何理由忽視《冤詞》的價值。既然《疏證》問世之初已被找到這樣多的問題，也就沒有理由相信《疏證》的疏漏僅此而已。

三 《疏證》枝蔓考

《疏證》(去標點)24.2萬字，在當時是巨著。全書八卷(闕第三卷)，每卷下分若干條，闕29條，實有99條。在每條之內又分若干條，第一條直書其文，此後依次冠以“按”，“又按”等。99條平均每條再分爲8到9條，共有880條左右。《疏證》難讀，其原因，一是章法零碎，二是“支蔓”太多。“支蔓”指與《疏證》主題(古文《尚書》“證僞”)毫無關係的內容。

紀昀《四庫提要》指出《疏證》編次“未歸條理”，且“支蔓”太多，“衍及旁文，動盈卷帙”。他認爲，閻氏擔心所著《潛邱劄記》失傳，故將其內容加入《疏證》。閻氏祇在兩處(第八十二、第一

①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276頁。

② 同上書，277頁。

③ 同上書，278頁。

④ 同上書，250頁。

百七)明確提到“載其《潛邱劄記》說於此”的原因是“恐世不傳”，其篇幅也祇各有三百餘字；而《疏證》“支蔓”的實際篇幅(約445條，13.5萬字)居然占全書篇幅56%。水分之大，天下少有。

閻氏當然知道此舉是對閱讀者很過分的戲弄，假如沒有非如此不可的必要，不會出此下策。錢穆先生注意到“閻書議論與梅氏(鷲)同者極多，而多不明引”^①。當時學術規範不如今天“健全”，大量抄襲畢竟會遭人非議。毛氏《冤詞》已對其抄襲梅鷲有所揭示^②。梅氏《尚書考異》條理清楚，先總論，後分篇。若閻書也有較嚴整編次，很容易通過比照發現“多不明引”問題。

他為此採用兩個辦法：一是有意識將《疏證》章法搞得零碎，讀者因此失去對專題內容作集中比照的條件；二是加入大量“支蔓”，進一步“遮擋”比照視線。還有一些經毛奇齡等人反駁已被證明很不合理的內容，也可以被“藏”在大量“支蔓”中。再者，任何人想要細讀該書進行駁難，會發現很難與之“正面交鋒”，他躲在“支蔓”的叢林裏與人周旋。

他佈置“支蔓”的方法相當高明。一是在邏輯上下工夫，比如在圍繞主題的正面論述中提到古代曆法，於是在後面加上一段與主題無關的議論曆法的“支蔓”。這是似是而非。這樣加進的“支蔓”，短則幾十字，最長一段超過四萬字。二是在結構上下工夫，開篇“支蔓”少，越靠後越多，將近結尾又少了。我將《疏證》880條分為九個部分(100+100+100+100+100+100+100+100+80)，每個部分對比“正文”和“支蔓”字數的比例，於是得到下面這個示意圖(白色柱表示“正文”字數，灰色柱表示

①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272頁。

② 同上。